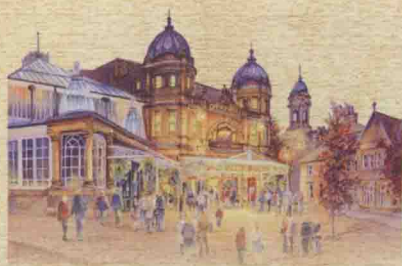


鼎新北科外语学者丛书



《牛津英语词典》 与众源编纂模式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nd the Crowdsourced Compilation Model

秦晓惠 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鼎新北科外语学者丛书

《牛津英语词典》与众源 编纂模式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nd the
Crowdsourced Compilation Model**

秦晓惠 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牛津英语词典》与众源编纂模式 / 秦晓惠著. —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4

(鼎新北科外语学者丛书)

ISBN 978-7-5663-1026-2

I. ①牛… II. ①秦… III. ①英语-词典编纂法-研究 IV. ①H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7426 号

© 2014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牛津英语词典》与众源编纂模式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nd the
Crowdsourced Compilation Model*

秦晓惠 著

责任编辑: 李 丽 史伟明 潘未兵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邮购电话: 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 010-64492342

网址: <http://www.uibep.com> E-mail: uibep@126.com

北京市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成品尺寸: 170mm×230mm 10.75 印张 181 千字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63-1026-2

定价: 45.00 元

本书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2WYC028, 2012—2014)

本书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鼎新北科外语学者系列著作”项目

(编号: FRF-BR-13-024) 资助

序

本书的论题属于词典学。词典是极普通的读物，哪个家里没有几本？所以，对词典人人可以说上话，譬如发现漏收了某个词条，批评某条释义不够好。词典学因此也不是一门冷僻的学问，词典编纂更是一门关乎社会全体的事业。不过，本书的关键词之一“众源方式”却有点生僻。这个词不仅一般的语文词典或百科辞书上不会有，就连专门收录词典学术语的书上暂时也查不到。术语虽然生僻，意思却很简单，即大家一起来编词典。

一件事情总有来由，而来由要从远处追起。重读晓惠的文稿，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中国之有辞书远早于西方，但“众源方式”却萌发于西方，这是为什么？会不会是因为西方词典编纂的路子有别于中国？

中西词典编纂传统的实质区别，在于中国既有字典又有词典，而西方只有词典没有字典。像《说文解字》这样的字典，西方人是没有的。西方人没有字典，是因为没有“字”；西文词典向以字母为序，以“词”为立目的单位。中国人编字典，则是以字为收条立目的单位。即使编的是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也是先列出单个的字，靠字来引出词目。汉字多得惊人，但再多也多不过词。相对而言，字更容易收全，遍览群书就能大抵穷尽汉字。在文献总量尚不大的上古，这是有可能做到的。故而字典可以一个人编，如东汉许慎竭尽搜罗稽考之力，撰成《说文解字》。词则无法尽收，因为词汇不能光靠从书上搜罗，还要从口说的语言中汲取。可以想见，即使在人口远少于今天的上古，穷尽汉语词汇也已经没有可能。因此，词典通常须由一班人合作，或者虽然署某人之名，实则含多人之功，例如西汉扬雄撰成《方言》，一方面利用了前人辑录的材料，一方面还频频往街头市廛，找外省人觅取方言词汇。

亲临街市搜求词语，如今称为“田野调查”，其精神固然可嘉，渠道却嫌单一，范围也颇受限制。假若扬雄换个做法，把搜集工作“外包”给各地人士，委托他们定期提供方言词语及释义，那就接近“众源方式”了。如此操作岂不是更方便省力，搜集的词条也会多得多？兴许扬雄曾经动过

这类念头，只是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经济条件不允许他这样做。但为什么之后的两千年里，中国人编辞书也没有采取“众源方式”呢？原因似乎有两个。第一，不久字典兴起，成为中国辞书编撰的主流，而编字典非但不需要群众参与，迄至近代甚至完全落入官家手中，于是清代跨四个世纪，仅见一本《康熙字典》。第二，即使就词典而言，辑录方言词汇的书也始终处在边缘，位居主流的是《尔雅》、《广雅》等雅学系列的作品。雅学书一般只关注古代书面语词，尤其是存录于经典文献及正统书籍的词语，因此也无须动员社会，不必采用“众源方式”。

反观西方，原本就没有字典，编的就是词典。况且多数欧洲民族语言的文献史不及汉语久长，古今语体不像文言与白话那样显著对立，方言的差异也小于汉语，所以，编撰者从一开始面对的便是一个连续、广大、无尽的词语系统，以个人之力难以应付，需要社会人士出手相助。18世纪上半叶，撒缪尔·约翰生编写《英语词典》（1755），虽然风格突出，世称《约翰生词典》，实际上借力于他人之处颇多。尤其一大批百科词目，因为自己所知有限，便经常直引别人书上的成段解说，如 aqua-vitae（酒精、烈酒）、aqua fortis（王水）、asafoetida（阿魏胶）、asbestos（石棉）、asphaltum（沥青）诸条，释义取自钱伯斯；asp（角蝰，一种毒蛇）、bat（蝙蝠）、chameleon（变色龙）、crocodile（鳄鱼）、elephant（大象）、lizard（蜥蜴）、pelican（鹈鹕）等条，释义取自卡尔梅；cubeb（草澄茄）、opium（鸦片），释义取自希尔；anise（茴芹）、louse（虱子）、raccoon（浣熊），释义分别取自米勒、斯威夫特、贝利。就此来看，约翰生其实是一位主编，把一些人所撰的条目汇编起来。凡属此类，约翰生都逐条标明来源，一则以志他人之功，二则也为表示自己只是客观引用，释义无论对错，责任都在他人。假如他面向各行各业，公开招募有志者供给词条，距离“众源方式”也就不远了。

约翰生之后的一个世纪里，科学的繁荣和社会的成长使得英语词汇更趋膨胀，词典编纂家个人越来越不可能把握词汇全体。19世纪中叶起，逐卷问世的《牛津英语词典》开始采取“众源方式”。这种运作方式无疑是时代催生的结果，但最终是否采用、用得如何，与词典主编有无脑筋和胆识，核心班子能否协调一致，资金是否充足等等也有很大关系。本书追踪“众源方式”的形成和演进，从古典时期一直到现当代，从纸本词典、电子词典延伸至网络词典，止笔于“人人都可参与编辑”的维基百科，是对“众源方式”发展全程的回顾，同时也包含对未来的瞻望：网络词典在持续推进，维基百科也在不断扩充，它们的起点就近在一二十年前，而远景则无

可限量。

“众源”是一种编纂词典的手段，可以广开词目源流，丰富释义路径。“众源”更是一个当代语言生活的理念，欲使民众当上自家词汇的主人，让词典编纂成为大众的事业。一种语言的词汇本该是一座公共库藏，人人可以徜徉其中并取而用之。然而，这座库藏一向由少数专家把持，民众只能从他们编制的清单上得知，自己的库里究竟收存了多少品类，各具哪些价值和效能。这样的清单便称为“词典”，所能载录的词目终究有限，所提供的解释也经常不能全面。其实“典”这一概念就决定了传统词典只会考虑通行的词语和正确的定义，指望藉此树立语言使用的规范。而一个词是否通行只是使用频率的问题，正误标准有可能随人们的语感、经验而波动，规范与否往往是几个人说了算，犹如历史上制订法典的始终是极少数人，却要求所有的人依法行事。

开放式的网络词典正在改变千年旧局，为民众赢得词目的收录权和解释权。网络词典的容量趋于无限，其广度和精度都将大大超过纸质词典，其多样化的理解角度和个性化的描述方式也非纸质词典所能比及。网络词典收录新词的速率也将快过纸质词典。就在追求稳妥的纸质词典踌躇再三，考虑有无必要收录某个新词的时候，这个词也许早就进入了网络词典，甚至可能已不再新奇。当代语言生活的丰富热烈和动态多变，令任何纸质词典都难以跟从，只有人人都可参与的网络词典才能适时调整，全方位地紧追并记录语言生活的步伐。

在社会共享的网络空间中，词典终将还归民众。

姚小平

2014年元月中

目 录

1 绪论	1
1.1 选题依据及意义	1
1.2 研究历史和现状综述	4
1.2.1 关于《大牛津》编纂史的研究	4
1.2.2 关于《大牛津》文本的研究	6
1.2.3 《大牛津》原始文献概述	8
1.2.4 国内研究概况	9
1.3 研究问题与目标	10
1.4 研究方法	10
1.4.1 学科史个案研究法	10
1.4.2 对比分析法	12
1.5 结构与框架	12
2 “众源方式”在《大牛津》中的体现和应用：前默里时代	15
2.1 《新英语词典》：“爱国主义与语文学的双重作用”	15
2.1.1 英语词典演进史：从难词注释到理查森的《新英语词典》	15
2.1.2 理论基石：比较语文学的兴起	18
2.1.3 《新词典》：科学历史主义	22
2.2 “众源方式”的体现和应用：前默里时代	25
2.2.1 众源方式的启用：内因和外缘	25
2.2.2 《提议》：对公众协助的吁请	27
2.2.3 柯勒律治：短暂的时日，长远的价值	29
2.2.4 弗尼瓦尔：热情无常的坚持者	31
2.3 本章小结	32

3	“众源方式”在《大牛津》中的体现和应用：默里时代	35
3.1	大词典的原材料：“垃圾和谬误的梦魇”	35
3.2	大词典的复兴：新“阅读计划”	37
3.2.1	詹姆斯·默里：“比约翰生更伟大的词典家”	37
3.2.2	“缮写室，牛津，詹姆斯·A·H·默里”	39
3.2.3	《呼吁书》：复兴之计	40
3.3	众源方式的体现和应用	43
3.3.1	聘用人员	43
3.3.2	志愿者大军：中流砥柱	46
3.3.3	激励措施	60
3.3.4	质量控制	61
3.3.5	志愿者个案：传奇的铸就	63
3.4	本章小结	68
4	“众源方式”在《大牛津》中的体现和应用：后默里时代	71
4.1	“趁热锻铸的铁”：一卷本《补遗》	72
4.1.1	缘起：词典的宿命	72
4.1.2	聘用编辑队伍	73
4.1.3	“众源方式”：零散的支持	74
4.2	过渡时期：间奏曲	76
4.3	继承和发展：四卷本《补编》	78
4.3.1	缘起：无法逃避的现实	78
4.3.2	众源方式的延续：变与不变	79
4.4	纸向电的飞跃：《第二版》	82
4.5	本章小结	84
5	“众源方式”的体现和评估：历史的重现与重构	87
5.1	“阅读计划”的土壤：民主和文化的传统	88
5.2	文献来源的变化：时代的风向标	89
5.2.1	《第一版》：“文学作品的索引”	89
5.2.2	《补编》：“现代性历程”	95
5.2.3	“新系列”：承前与启后	101

5.3 本章小结	105
6 “众源方式”在《在线大牛津》中的应用：新颜与旧意	109
6.1 《在线大牛津》：动态的语库	109
6.2 “众源方式”的体现：新颜与旧意	110
6.3 本章小结	117
7 “众源方式”在当代词典学与语言学中的应用：现状与前景	119
7.1 《维基词典》：“人人都可参与编辑，人人都可免费使用”	120
7.1.1 民主平等，开放互动	121
7.1.2 “源”自公众，归“馈”公众	122
7.2 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人脑胜于电脑”	123
7.3 国内应用一览	125
7.4 本章小结	127
8 余论	129
参考文献	133
附录	143

图 目 录

图 1.1 “众源方式”的运作模式	2
图 2.1 《提议》规定的引文卡格式	28
图 3.1 《呼吁书》附录的引文卡样式	41
图 6.1 “提交表”界面	114
图 6.2 “《大牛津》呼吁”界面	115
图 6.3 “贡献《大牛津》”“读者指南”界面	116
图 6.4 “《大牛津》呼吁”“渴望词汇”界面	116

表 目 录

表 3.1	三版“待阅书单”的文献分布	41
表 3.2	四位主编各自主责的字母及刊行时间	44
表 3.3	大词典年度开支预算明细	46
表 3.4	最多产义务资料员一览表	48
表 3.5	主要义务分编一览表	51
表 3.6	维多利亚时代主要作家兼学术顾问	55
表 4.1	《补编》多产义务资料员一览表	81
表 4.2	《大牛津》各版主要数据一览	82
表 5.1	《大牛津》各时期“阅读计划”文献数据一览表	90
表 5.2	《第一版》引用最多的二十位作者	91
表 5.3	《第一版》引用最多的二十本书	92
表 5.4	《第一版》引用最多的二十种报刊	93
表 5.5	《补编》引用最多的二十位作者	96
表 5.6	《补编》引用最多的二十本书	97
表 5.7	《补编》引用最多的二十类期刊	99
表 5.8	“5 000 新词系列”引用最多的二十位作者	102
表 5.9	“5 000 新词系列”引用最多的二十类报刊	103
表 7.1	MTurk 工人的主要动机类型	124

绪 论

1.1 选题依据及意义

“众源方式”(Crowdsourcing, 通译“众包技术”)是由“crowd”和“outsourcing”组成的合并词,最早由杰夫·豪(Jeff Howe)于2006年提出(Howe 2006),指企业或组织(The Crowdsourcer)通过公开呼吁,调动并利用大众(The Crowd)的创意和能力。“众源方式”是劳动力组织的一种全新模式,早期主要应用于商业范畴如软件业、服务业等,现已广泛应用于文化、地理、教育、医学、语言等社会各个领域,如图库网(iStockphoto, 由全球业余摄影爱好者共建的图片共享和交流平台)、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历史报刊项目(Australian Historic Newspaper, 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应用“众源方式”的图书馆项目,旨在鼓励公众改良过期报刊的电子译本)、《维基百科》(Wikipedia, 当今最具影响力的自由、免费、内容开放的百科全书协作计划)等。这些项目中,广大志愿者和业余人员,愿意利用空余时间工作,满足于获得小额报酬,或者暂无报酬,仅仅获得精神满足。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利用群体智慧完成某项任务或某个项目,都可以称作“众源方式”。

图 1.1 演示了“众源方式”的运作模式。从图 1.1 中可以看出,众源方式的发起者(可以是个人、企业或机构)通过众源工具发布任务。大众则通过贡献自己的能力、智力、创意、智慧完成分配的任务。通过这一过程,他们可以得到一定的激励。这种激励可以是外在的,如物质、金钱的奖励,也可以是内在的、精神上的鼓励,如有的人希望创造出更多让人受益的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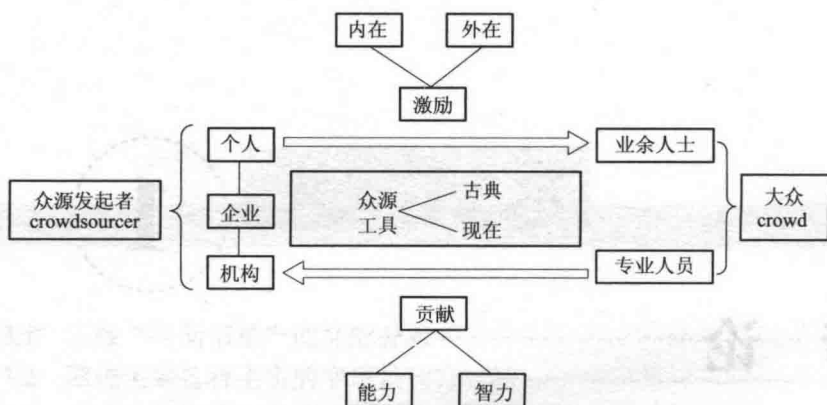


图 1.1 “众源方式”的运作模式

西，有的人期待更有意义地打发时间，有的人仅仅为了体验一展所长带来的纯粹快乐。众源工具的古典体现形式是公开的呼吁、宣传，现代的体现形式是基于互联网的社区空间。

国外大量文献介绍了“众源方式”在上述领域的广泛应用（Cove 2007; Brabham 2008a, 2009a; Howe 2008; Leimeister et al. 2009; Noveck 2009; Doan et al. 2011）。Kaufman（2008）和 Hinchcliffe（2009）列出了商业上应用“众源方式”的几大优势，包括分解设计任务、吸引专业人才、降低劳动成本以及提高工作效率等。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 Web2.0 技术的发展，“众源方式”的技术手段和应用范围都有了大幅度提高，现在这一术语专指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人力运作方式。DeVun（2007）认为，相比传统面对面的大众合作项目，基于网络方式的优势在于互联网匿名宽松的环境使得参与者不必受制于人际交往的困扰，从而更关注自身的努力和产出的成果。不少学者的研究发现，参与众源项目的个体都收获了良好的经历和收益（Lietsala and Joutsen 2007; Brabham 2008b, 2009b）。对于“众源方式”的负面效应如费用超支、参与者兴趣低下、产出质量不高等，也有一些研究涉及（Cove 2007; McNichol 2007）。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语言技术中心及言语处理中心（Human Language Technology Center of Excellence & Center for Language and Speech Processing）是“众源方式”在语言学中应用的最前沿研究阵地。该中心致力于以“众源方式”为技术核心的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 简称 MTurk）的研究，主要探讨其在大规模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翻译中的应用，重点推广其在高效、低价

收集海量数据,建立大型语料库等方面的优势(Callison-Burch and Dredze 2010; Callison-Burch and Zaidan 2011)^①。

“众源方式”的概念虽说近年才被提出,但其核心理念在词典学上却可以追溯到19世纪。1838年由格林兄弟(Jacob and Wilhelm Grimm)着手编纂的《德语词典》(*Deutsches Wörterbuch*)可以看作“众源方式”在词典编纂中最早的应用。作为欧洲大陆第一部伟大的历史主义词典,该词典招募了83位志愿者,承担阅读文献、收集词条引语的任务。西方语文学及英语词典史上最全面最权威的造极之作《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英文简称 OED^②, 中文简称《大牛津》)堪称“众源方式”应用的典范。它以比较语文学为理论依据,以历史主义原则为编纂基础,以客观呈现英语词汇全貌为编纂目标,其恢宏详尽的篇幅和精良缜密的技艺,超越了前代所有英语词典的成就。《大牛津》跨越了三个世纪的编纂历程,经历了《第一版》(1857~1928)、一卷本《补遗》(*OED Supplement*, 1928—1933)、四卷本《补编》(*OED Supplement*, 1955—1986)、《第二版》(*OED2*, 1982—1989)以及正建的在线《第三版》(*Online OED*, 1990—)五个阶段。成书过程中广大志愿者戮力奉献,从收集原始素材到点评成形版面,每个严密无际的词目背后都倾注着众多业余人士的时间和心血,堪称“合力工程”的经典之作。

《大牛津》之前的英语词典编纂均由职业词典家或文坛、语学大家凭其厚实的语言功底、敏锐的智识才华及卓越的艺术赏鉴独自钻研,属个人的造就和创获^③。至现代,一般的常规模式则是由职业编辑组成编委会,各位编纂人员从主编、责编到编校等区划分明、各履其责。本研究所关注的以

① 本人在霍普金斯大学访学期间,参与了该中心的 Kenneth Church 和 Chris Callison-Burch 两位教授的在研项目,对 MTurk 的运作机制和“众源方式”的合作原理深化了理解。

② 本文在参引时简称《大牛津》。语文学会最初提议的名称为《根据历史原则并主要基于语言学会所收集的资料而编纂的新英语词典》(*A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Founded Mainly on Materials Collected by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本文简称《新词典》。《大牛津》第一版10卷、128分册均以此名称出版(1884—1928)。1895年,第12分册(*Deceit-Deject*)出版时《大牛津》的名称开始出现在外封套上,但题名页仍沿用《新词典》。1933年,调整为12卷的《新词典》正式更名为《大牛津》与一卷补编本共同发行。

③ 约翰生编写《英语词典》,历时八年。期间先后聘请了六位誊写员,因此学界曾有人质疑《英语词典》是否成于约翰生一人之手。一般的观点是约翰生独立完成了从词典宏观构思到微观结构的所有原创性工作,是《英语词典》最重要的作者。由于约翰生与六位抄写员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因此并不属于本研究所要探讨的以“众源方式”为基础的编写模式。

“众源方式”为基础的词典编纂模式中，其“众”等量于“大众”，即无雇佣关系的社会志愿群体、非专业工作者；其“源”体现于“大众”在词条建设、清样校订等各个环节中的广泛参与和贡献。据作者了解，“众源方式”在词典学中的应用，国外尚无探讨的先例。在国内，目前还没有学者对“众源方式”在网络上的应用进行系统评介，也无人涉及其在语言学中的应用。本研究将首探“众源方式”这一互联网概念在古典权威《大牛津》中的诠释途径，揭示伟大经典中的现代理念；考察当代基于“众源方式”的网络词典运作模式，探究现代技艺中的古典渊源；展望在因特网技术背景下，“众源方式”在词典编纂和语言学其他分支进一步应用的前景。

1.2 研究历史和现状综述

1.2.1 关于《大牛津》编纂史的研究

与作者一样，大多数研究《大牛津》的学者都对伊丽莎白·默里(Elizabeth Murray)心存敬意。作为大词典核心人物——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的孙女，她以海量可考文献和家族素材为基础，信而有据，撰写了默里的生平传记《坠入字网：詹姆斯 A.H. 默里和〈牛津英语词典〉》(*Caught in the Web of Words: James A. H. Murray and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979)。与一般传记作品不同，本书以《大牛津》为主线，详述了默里的出身、求学、个性、经历等方面如何契合大词典的要求，以及成为主编后如何创建和恪守严格的学术标准，将大词典推向最终的胜利。词典编纂进程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也被着重体现。作为一部翔实可信的断代史，但凡涉及《大牛津》编纂历史的著作，均将此书作为重要史料来源，无不参考借鉴。1998年，《坠入字网》中译本问世，译者魏向清、范红升用朴实细腻的笔触如实还原了默里的非凡人格和《大牛津》成书的艰辛磨难，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这部巨著的窗口。

琳达·莫格尔斯顿(Lynda Mugglestone)和夏洛特·布鲁尔(Charlotte Brewer)是当代大词典研究阵地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学者，两人均供职于牛津大学，均从历史的角度著书立说。前者也是大词典研究最多产的学者之一。“史学家而非批评家：《大牛津》中的语词惯用法标准”(An Historian not a Critic: The Standard of Usage in the OED)探讨了默里等主编对语词惯用法标准确立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评价了大词典中描写主义和规定主义的模

糊界限(2000: 189-206)。“披荆斩棘的先驱者:《新英语词典》”(Pioneers in the Untrodden Forest: The New English Dictionary)评述了大词典项目实际进程中,理论和现实局限导致了与“包容性”、“客观性”、“经验性”和“描写性”等编纂原则相悖的种种不一致性(2000: 1-21)。

上述这些矛盾在《迷失词林:〈牛津英语词典〉秘史》(Lost for Words: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005)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该书以《第一版》原始校样为素材,描记大词典缜密无隙的印刷版面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它揭示了每个词条拼写、注音、词源、意义及引语的合法性(Legitimacy)和正典性(Canonicity)所经历的反复的批判和争议,反映了主观因素、现实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时代因素如何与追求客观全面的学术理想相斥,以致“常不得已低头妥协,语词全景图的目标让行”(Xix)。此书的缩减精华版“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收录于《牛津的英语词典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exicography)第一卷(Cowie 2009: 230-259),论述《第一版》的缘起、起伏、低谷、复兴和评估。《词典史》对于《第一版》后续历史的介绍则由夏洛特·布鲁尔和埃蒙德·维纳(Edmund Weiner)执笔,分别回顾两版补编本的历史和大词典的电子化历程(同上: 260-278; 378-409)。

夏洛特·布鲁尔的著作《英语宝库:活生生的〈大牛津〉》(Treasure-house of the Language: the Living OED, 2007)致力于对后默里时代大词典编纂史的描记:从1928年4月19日《新词典》杀青,到1984年5月15日“新《牛津英语词典》项目”发轫。与《字网》和《秘史》叙史手法类似,《宝库》追溯了1933年一卷《补遗》、伯奇菲尔德四卷《补编》、《第二版》至在线《第三版》的历史,“揭示了两大共存目标之间的(编社阵营之间的)紧张关系:(1)使《大牛津》尽善尽美;(2)依可行的速度,投入可承受的成本,以此续出补编与新版”(2007: 8)。作为一部近似通史的研究,本书的研究角度实属难得。唯一不足是第四章“英语宝库:《大牛津》的角色与功能”与前后历史叙事格格不入,且将大词典的文化功能、语料来源等重要问题一笔带过,以作者之见,实为一大败笔。

早在这两位牛津学者的研究之前,乔纳森·格林(Jonathon Green)的《追逐太阳》(Chasing the Sun, 1996)就向我们勾勒了一幅《大牛津》主要人物的群英图。该书旨在梳理自前巴比伦时期至20世纪末的词典进化史,第十三章回顾了《大牛津》主要创作者的事迹和贡献。本章中,作者用来介绍大词典最负盛名的义务读者之一,威廉·切斯特·迈纳(William